

## 安全研究

## 美国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角色调整

王勇辉 陈 慧

**摘 要：**伊拉克战后的安全问题令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备受国内外批评，使得后布什时代的美国政府将解决巴以问题作为突破口，一改往日对巴以问题的冷漠态度，转而主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采用多重“遏制战略”和“平衡战略”以实现自身角色的调整。然而，由于巴以问题的复杂性和美国全球霸权结构的利己性，布什政府的角色调整对于巴以和平进程具有双重绩效。

**关键词：**遏制战略；平衡战略；后布什时代；巴以和平进程；角色调整

**作者简介：**王勇辉，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讲师（湖北武汉 430079）；

陈慧，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 2007 级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9）。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8) 02 - 0058 - 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国内的安全问题和新政权的稳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美国以伊拉克为跳板构建大中东民主版图的现实也遥遥无期，这使得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备受国内政敌和民众的强烈批评。早在 2006 年 11 月的中期选举中，美国民主党胜出控制众议院，对布什的内外政策形成强力掣肘，美国外交开始步入后布什时代——一个随着任期时间后推而对先前的对外政策不断修正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布什政府以重新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为突破口，藉以摆脱伊拉克问题上的外交困境。从 2005 年 10 月阿巴斯第一次访美到 2007 年 11 月的安那波利斯（Annapolis）会议，布什政府主导下的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不断地在美国中东政策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由于国会的制约和任期即将结束，为摆脱外交困境，布什政府在对其中东政策进行修正的同时，也随之调整美国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角色。

## 一、从“民主遏制”到“超权力遏制”

在布什政府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中，如何处理哈马斯的抵抗政策被视为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的关键所在。在对待哈马斯的政策上，布什政府的相关政策又表现出多面性：既有沿承往届政府以武力打击为特征的“权力遏制”一面，又有以引导或胁迫巴勒斯坦国民意向为特征的“民主遏制”的一面，并由“民主遏制”逐渐升为“超权力遏制”。2006 年 1 月，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立法选举中胜出，从而得以组阁执政。由于哈马斯在巴以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

一向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因此，哈马斯上台伊始，美国就立即对其实行“遏制战略”，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阻挠和破坏，企图最终颠覆之。就具体形式而言，布什的“遏制战略”主要有三种：

其一是“民主遏制”战略。在布什构建大中东民主版图的战略中，美国式民主化是一大特征，其表现为：在布什政府推行的中东民主计划中，以合乎美国中东战略利益为准则和类似美国式的文化思维为基础，试图通过充分民主的选举方式产生一个能够充分代表民意的政府。但出乎布什政府意料的是，虽然巴勒斯坦民众以充分民主的方式选举了新的政府，但这并不符合美国文化思维，因为哈马斯赢得了主政的权力。在被自身所主导的民主战略不能满足自身所需要的民主方式时，布什政府采取了“民主遏制”战略，即通过推行美国式民主反对非美国式民主。哈马斯上台后，美在切断其与外界联系的同时，又鼓动阿巴斯下令重新进行选举，试图以所谓“民主”的方式来颠覆哈马斯政府，却因遭到众多代表的反对而无果，但布什政府并未放弃这一战略。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政府以哈马斯组建的新政府拒绝承认以色列和放弃暴力为由，在2006年4月9日声明将哈马斯主导的巴政府视为“敌对当局”，拒绝承认哈马斯政府的合法性，表示不会与其接触。2006年12月6日，在赖斯访问巴勒斯坦后，阿巴斯决定解散巴立法委员会，提前举行巴立法委员会和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选举，美以两国随即表示支持。不过，阿巴斯的这一决定遭到哈马斯等10个主要派别的强烈抗议，最后不了了之，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再次遇挫。巴勒斯坦联合政府成立后，由于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政见分歧和权力争夺矛盾日益尖锐，哈马斯武装力量于2007年6月13日在加沙向法塔赫发起进攻，最终全面控制加沙。于是阿巴斯指责哈马斯发动内战，下令解散哈马斯政府，另组紧急政府，但哈马斯仍然占据着加沙。巴勒斯坦由此出现了“两个政府”，陷入半分裂状态。<sup>[1]</sup>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不但不承认哈马斯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支持包括阿巴斯在内的所有权力实体对哈马斯的遏制行为。布什政府的“民主遏制”战略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哈马斯内阁并未辞职，其政府更未被彻底整垮。

其二是“权力遏制”战略。布什政府在以“民主”的方式打击哈马斯的同时，还对其实行“权力遏制”战略，即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军事打击和外交封锁等方式来颠覆哈马斯政府。在推行“权力遏制”战略方面，布什政府着重发挥“硬权力”所具有的制裁和威慑效果；在具体措施方面，美国支持以色列切断加沙同约旦河西岸的联系；命令外交官和承包商断绝与巴内阁各部门的一切联系；停止对巴政府的直接经济援助；支持以色列拒付代征的巴税款并策划武力进攻哈马斯。2006年3月底，即哈马斯政府宣誓就职后不久，在美国的号召下，加拿大政府率先宣布暂停对巴自治政府的援助。欧盟委员会于同年4月7日宣布，终止对巴自治政府的直接经济援助，暂时不会向巴勒斯坦当局支付资金，或让其经手资金。布什政府的“权力遏制”战略特别是经济制裁使哈马斯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也没有停止武力打击加沙地带哈马斯分子，并继续把武力行为视为“以色列军队与恐怖分子的战争”，并拒绝与哈马斯展开停火谈判。面对美以的“权力遏制”，哈马斯政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创，不得不转而寻求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等非美国盟友的帮助。

其三是“超权力遏制”战略。“超权力遏制”战略是“权力遏制”战略的延伸和发展，但

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同“权力遏制”有所区别。“权力遏制”战略着重发挥“硬权力”的制裁和威慑效果，而“超权力遏制”战略着重发挥“硬权力”的支持和援助效果，以硬权力支持敌对方的对手，从而间接地达到遏制和威慑敌对方的目的。布什政府在全力打压哈马斯的同时，不断加强对阿巴斯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美以将阿巴斯视为巴以和谈的巴方代表，而将哈马斯领导人排除在外；将经济援助直接交给法塔赫的市长，用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拨出巨额款项赞助阿巴斯恢复和巩固法塔赫；在巴紧急政府成立后，美立即恢复对巴政府的直接经济援助和正常交往；<sup>①</sup>帮助武装阿巴斯卫队，增强其与哈马斯武装对抗的实力。正是凭借以“权力遏制”战略为基础的“超权力遏制”，布什政府试图巩固和提高阿巴斯及其领导的法塔赫在巴政局中的地位，削弱哈马斯在巴民众中的影响，使巴勒斯坦政局和巴以和平进程能够沿着美国所设计的轨道发展。

## 二、从“一边倒战略”到“平衡战略”

巴以和平进程为何几十年来一直沉浮未定，这与历届美国政府在其中的角色担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起，以色列就成为美国同其他大国争夺中东霸权的一根重要的战略支柱。因此，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历届政府都执行“一边倒”的安全战略，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全方位支持以色列。布什政府上台后，继承了此战略，在巴以冲突中明显偏袒以色列：在指责巴人民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为恐怖活动的同时，更是将以色列打击哈马斯视为“反恐行为”；在要求阿巴斯对巴民族权力机构进行民主改造的同时，不履行支持巴方在2006年建国的承诺；在逼迫阿巴斯收缴巴激进派武装的同时，又默许纵容以色列“定点清除”巴激进派领导人。“一边倒”战略加大了巴以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巩固和增强了以色列作为美国中东霸权支柱的实力和地位，但却导致巴激进派别与以色列的暴力冲突日趋激烈，同时也加深了阿拉伯—伊斯兰民众对美国 and 以色列的不满和仇恨。<sup>[2]</sup>

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地区安全困境使布什亟需在外交领域有所建树，其突破口就选择在巴以和平问题上。于是，布什政府暂时搁置了“一边倒”战略，而代之以“平衡战略”。在具体措施上，美要求限制以色列有害和平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巴方的支持力度，鼓励双方进行接触，试图在巴以之间充当一个不偏不倚的“和平使者”的角色，来促进巴以和平问题的解决。为配合此战略，布什政府反对以总理奥尔默特提出的采取单边行动划定与巴分离的永久性边界的主张，批评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建房计划“将为巴以和谈蒙上阴影”；对以色列部分解禁对巴的代征税款表示欢迎；呼吁以色列对巴激进组织发动的火箭袭击保持克制；鼓励以色列为和平迈出勇敢的步伐。赖斯还表示，美将把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共享和平与安全的巴勒斯坦国作为明确的目标而努力。<sup>②</sup>

“平衡战略”的高潮体现在布什政府于2007年11月主办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安纳波利斯会议”，此次国际会议有多达4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巴以双方在会上达成“共

<sup>①</sup>参见新华社华盛顿2007年6月18日电。

<sup>②</sup>参见新华社华盛顿2007年12月18日电。

同谅解文件”，承诺将努力在 2008 年底之前制订一项和平共处的条约。<sup>[3]</sup>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项：第一，由巴以双方就巴勒斯坦建国表达举行谈判的意愿与承诺；第二，巴以双方将对落实布什 2003 年提出的“和平路线图”第一阶段措施做出具体承诺；第三，就巴勒斯坦政府政治、经济机构的建设所采取的行动，听取巴总理法耶兹和中东问题四方特使布莱尔的报告。为避免失败，美国一再降低衡量会议成败的标尺。国务卿赖斯和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哈德利都一再表示，这并不是进行一次谈判的会议，而是一个推动谈判开启的会议，会议只是为启动和平谈判提供了一个机会，真正的和谈将于会后举行，并力争于 2008 年底前，即在布什总统卸任之前，达成一份和平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标志着布什政府的“平衡战略”推行得较为成功，因为巴以双方已经坐在了一起并承诺开始举行和平谈判。当然，“平衡战略”的成败最终要视巴以双方谈判能否在未来的预定时间内取得成果来评定。

“安纳波利斯会议”之后，小布什、奥尔默特和阿巴斯于 2008 年 1 月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美国领事馆举行三方会谈，主要议题是巴以冲突核心问题，即巴以边界划分、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及耶路撒冷分治。巴以重启和平谈判，并先后举行了两轮磋商。不难看出，“平衡战略”是小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陷于困境后，试图在巴以问题上有所作为，以便能在历史上留一笔值得一书的外交遗产所做的“最后赌博”。

### 三、美国角色调整对巴以和平的绩效评议

布什时期美国政府所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是围绕构建“大中东民主”这一总体战略展开的，在不同时期，布什政府所采取的具体战略有所不同。在后布什时代，美国政府在巴以和平问题上围绕“遏制战略”与“平衡战略”进行了角色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角色调整对于巴以和平进程有着正面绩效，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美国的角色调整虽然是顺应其“大中东政策”的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巴以对和平的需求。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布什政府出台“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试图在中东各国强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体制。而中东各国出于民族命运、政权稳定和宗教信仰的考虑，强调“中东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中东的未来”，对美国的民主改造计划加以抵制。<sup>[4]</sup>面对计划受阻的尴尬现实，布什政府不得不更换手法，更多采用柔性拉拢手段，将该计划改为“面向进步与共同未来伙伴关系计划”，加入重视解决巴以冲突的内容，打算以促进巴以和平进程为杠杆，扭转“大中东政策”所面临的流产命运。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经过多年的暴力冲突，均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早已不堪重负，双方的温和派领导人和普通民众都渴望早日结束冲突，获得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是在各自的内部都存在实力雄厚的强硬派，温和派领导人实质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要重开和谈，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外部助推器”加以推动才能实现。布什政府这次转变对巴以问题的态度和政策，调整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角色，恰好符合巴以双方对和平的需求，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继续前进。

第二，美国的角色调整虽然是布什政府的政绩观所需<sup>[5]</sup>，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巴以和平进程寻求“权力”和“金钱”的支持。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

在外交上推行“单边主义”政策，以反恐为名，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结果却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淖，人员损失惨重。<sup>[6]</sup>一度被寄予厚望的“大中东计划”遭到中东国家的抵制而失去实效，借“核问题”对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伊朗和朝鲜大力打压和制裁，最终朝核问题并未获得彻底解决，而伊核问题则被证明是一场闹剧。<sup>[7]</sup>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使布什在外交领域乏善可陈，国内遭到猛烈抨击，国际上则陷入孤立和被动。随着任期即将结束，布什为了给自己留下政治遗产，封住国内批评之口，一改以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无为”做法，不但对其“大中东计划”作出重大修正，还为阿巴斯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积极提供财力和外部权力支持，领导由 25 个国家和 6 个国际组织构成的国际协调小组为建立巴勒斯坦国提供安全、政治、经济和财政等方面的援助，主持召开了自 2000 年戴维营会议以来最大规模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安纳波利斯会议”。这些措施增强了巴勒斯坦和平建国的信心，为巴方推动巴以和平进程起到了“权力”和“财力”的保障作用。

第三，美国的角色调整在本质上属美国全球霸权结构的内在整合，但在促使巴以和平进程摆脱大国政治的束缚方面走出了一大步。中东处于亚、非、欧三大洲交汇处，拥有占世界总储量三分之二的石油资源，决定了中东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控制中东就成为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中东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中东从来就是一个大国逐鹿的舞台，其和平与战争被打上了深深的大国政治的烙印。历史上，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沙皇俄国都曾在这里展开激烈角逐。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使得中东地区成为美苏争霸的演义场。<sup>[8]</sup>后来，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老布什政府领导发动海湾战争打败了萨达姆。至此，美国在中东确立了最终的主导地位。但是，阿以争端、巴以冲突、伊拉克乱局、伊朗核问题却给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布什政府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中东，确保美国的全球霸权不受中东动荡局势的损害，以重整美国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角色为突破口来调整自己的中东政策，在巴以和平问题上采取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使巴以问题首次排除了多个大国争夺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大国政治多重博弈下的阴影，巴以和平进程得以注入良性发展的因子。

但是，由于美国的角色调整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和布什政府的脱困需要，因此对巴以和平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很明显的。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布什政府对哈马斯政权的“民主遏制”和“权力遏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主权利，加剧了巴勒斯坦内部权力合法性的斗争，导致巴以和平进程中一个有效实体的缺失。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主旨就是在中东地区推行美式民主和自由体制，实行多党制和民主选举，以此从根本上消除所谓的恐怖主义。而正是凭借民主选举，一向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才得以组阁执政。如今，弄巧成拙的布什政府不仅拒绝承认哈马斯政府，还对其实行“民主遏制”和“权力遏制”，实质上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极度蔑视和严重损害。而且，美国还卷入巴勒斯坦内部的权力斗争。布什政府在对哈马斯政府进行遏制的同时，大力支持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使法塔赫与哈马斯的权力争夺更加白热化。如果巴内部的权力分配矛盾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相关各方不能团结一致，则会削弱巴方在巴以和谈中的实力和地位，致使巴以和平进程缺少一个具备有效功能的实体。

其次，美国的“平衡战略”不能保证巴勒斯坦在巴以和谈中对美国有信心。一旦“平衡战略”有所改变，将会导致巴勒斯坦对美国主导下的巴以和平进程进行重新评估。如前文所述，布什政府是出于自身利益在巴以之间实行“平衡战略”，充当貌似公正的“和平使者”来推动巴以和谈。但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作为美国控制中东的战略支柱，以色列对美国的重要性远超巴勒斯坦，美以的传统盟友关系在现在和将来都必然牢不可破。<sup>[9]</sup>因此，布什政府的“平衡战略”，只不过是促使以色列在某些具体的议题上同巴勒斯坦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不会对以色列的既得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从巴勒斯坦方面来看，虽然阿巴斯在接替阿拉法特出任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后，力主在美国的主导下解决巴以问题，但布什政府却因伊拉克问题对阿巴斯的呼吁并无回应，听任巴以暴力冲突不断。美国的这种态度导致主张和谈的法塔赫在巴民众中威信下降，而坚持暴力抗以的哈马斯则影响不断扩大，最终赢得立法选举。可以说，阿巴斯当前的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造成的。现在布什政府实行“平衡战略”，虽然暂时提升了法塔赫和阿巴斯的地位，但哈马斯在巴民众中仍然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众多的支持者，而且还控制着巴的半壁江山，阿巴斯作为弱势领导人的现状并无实质性改变。鉴于美国对巴以问题的历史态度和政策，其“平衡战略”并不能确保巴勒斯坦对美国推动巴以和平的信心。一旦“平衡战略”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巴方温和派基于对法塔赫和个人政治前途的考量，必然会对美国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予以重新评估。

再次，布什政府推出试图彻底解决巴以问题的“平衡战略”加剧了巴以问题的复杂性，具体表现在五大方面：一是“平衡战略”的不平衡性。在美国的战略天平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分量不可同日而语，布什政府很难真正做到对双方不偏不倚；二是“平衡战略”的不确定性。“平衡战略”是在布什政府因外交政策失误而招致国内广泛批评的背景下出台的，作为一种应急手段，缺乏长远的运筹和规划，而且布什的总统任期也剩余不多，后任总统是否继续推行此战略还是未知之数；三是“平衡战略”的资金需求。12月17日在巴黎召开的援助巴勒斯坦国际会议上，阿巴斯提出希望到2010年能够获得56亿美元的国际援助。<sup>[10]</sup>在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黯淡、美国已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费不貲、欧盟各国受困于国内问题的情形下，巴民族权力机构能否及时获得足额的所需款项，实在令人怀疑；四是巴以领导人的弱势地位。在各自内部，奥尔默特是弱势总理，阿巴斯也缺乏阿拉法特的威信。而双方实力强大的反对派都批评和拒绝“安纳波利斯会议”上达成的“共同谅解文件”。<sup>[5]</sup>奥尔默特和阿巴斯不能全力配合布什政府的“平衡战略”，这种情形必然会妨碍“平衡战略”效力的充分发挥；五是其他势力的介入。布什政府的“民主遏制”、“权力遏制”和“超权力遏制”战略迫使哈马斯寻求其他对中东局势有影响力的国家的支持。在美俄矛盾、美伊矛盾、美叙矛盾、巴温和派和激进派矛盾未获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布什政府单靠“平衡战略”难以真正实现巴以和平。何况基地组织对“安纳波利斯会议”的强烈批评，也显示其对巴以问题不会袖手旁观。

最后，美国的全球霸权政治给巴以和平进程带来了“权力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巴以双方认识到大国权力对和平的重要性，而削弱了内在意识对和平的保障功能。美国一向因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而有着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和自豪感。冷战结束后，美国宣称已从西方世界的领袖变成了世界的领袖，是各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灯塔”。

美国的领导责任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变成“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并用“榜样”的作用和实力促进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民主、自由、社会制度、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sup>[11]</sup>其本质还是企图确立美国的全球霸权。不过，在确立全球霸权的过程中，美国更多依靠的并非“榜样”这样的“软权力”而是军事、经济这类硬实力构成的“硬权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给巴以和平进程带来了“权力效应”：巴以所能深刻感受到的只是美国强大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硬权力”，而不是其自称的构成天然精神领袖资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软权力”。因此，在面临大国权力阴影下的安全与威胁困境时，巴以双方都可能通过大力发展以军事为主的“硬权力”来寻求和平保障，或者投向其他大国寻求庇护。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全球霸权政治下的巴以和平保障是把“双刃剑”，既使得巴以和平有向前迈出一步摆脱大国政治的可能，也使得巴以和平一旦因为失去大国权力保障而更加倚重“硬权力”的潜在危险。

#### 四、结语

在后布什时代，美国政府在巴以和平进程中对巴方的 Hamas 政权施加“民主遏制”、“权力遏制”及“超权力遏制”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虽能增强巴内部温和派的力量，打击和削弱激进派的势力，使巴勒斯坦的政治尽可能沿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同时这些战略却极大地激化了美国与巴激进派的矛盾，更加剧了巴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冲突，导致本来就处于动荡之中的巴政局更加不稳定。<sup>[12]</sup>这样既不利于巴方团结一致全力推动和平进程，也使美国“和平使者”的角色难以获得巴全体民众的认可，其榜样作用大打折扣。甚至也为其他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契机，使得巴以和平进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而，“民主遏制”、“权力遏制”及“超权力遏制”等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美国控制巴勒斯坦政局和巴以和平进程的一道必须而又难以克服的障碍。

总之，在应对作为美国中东政策困境突破口的巴以和平问题方面，布什政府角色调整的主要特征是遏制与平衡。但能否真正全面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美国还需要更丰富的智慧、更明智的策略和更高明的技巧来化解上述挑战。否则，巴以和平进程也终将止步于“安纳波利斯会议”这一协商层面上。

#### [ 参考文献 ]

- [1] 刘锦.一个巴勒斯坦,两个政府[N].解放日报,2007-06-16.
- [2] 安惠侯.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调整和再调整[EB/OL]. [2008-01-20].  
<http://www.cqzg.cn/80157/viewspace-18753>.
- [3] 马小宁,黄培昭,伊文.美中东和会“辉煌而空洞”[N].环球时报,2007-11-29.
- [4] 杨福昌.美国的“大中东改革计划”实现难[J].阿拉伯世界,2005(5).
- [5] 管克江,张振安,黄培昭.哈马斯与中东和会对着干[N].环球时报,2007-11-28.

- [6] 杨晴川. 美为伊战“失血”到何时[N]. 人民日报, 2007-3-20.
- [7] 管克江, 刘守望, 石华, 汪北哲. “伊朗无核武”震惊美国[N]. 环球时报, 2007-12-05.
- [8] 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 战后国际关系史(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9] 安纳波利斯和会后 中东向何处去? [EB/OL]. [2008-01-28].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12/03/content\\_7188564.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12/03/content_7188564.htm).
- [10] 巴黎开会帮巴勒斯坦建国[N]. 环球时报, 2007-12-18.
- [11] 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 战后国际关系史(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2] 马海兵. 巴勒斯坦派系冲突令人担忧[N]. 光明日报, 2007-06-15.

## The Adjustment of U.S. Role in Palestine-Israel Peace Process

WANG Yonghui CHEN hui

**Abstract**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for its dilemma in Iraqi security issues. Therefore Post-Bush administration pushes forwards Palestine-Israel peace process as the breakthrough of its foreign policy, and actively adopts multi-level containment and balancing policies to implement its role adjustment by its traditional off-hand policy. For the complexity and the self-interest of American global hegemonic structure, the role adjustment of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dual effects on Palestine-Israel peace process.

**Key Words** Containment Policy; Balancing Policy; Post-Bush Administration; Palestine-Israel Peace Process; Role Adjustment

(责任编辑: 李 意)